

# 文化视界中的文学

著

陈继会

WENHUASHIJIETZHOHONGDIEWENXUE

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继会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文化视界中的文学

# 目 录

---

|                            |       |
|----------------------------|-------|
| 导语:文学—文化批评的尝试 .....        | (1)   |
| 第一章 文学:文化·历史·生命 .....      | (6)   |
| 1.1 文化视角中的五四乡土小说 .....     | (7)   |
| 1.2 关于城市文学的文化前考察 .....     | (20)  |
| 1.3 对文化失范的困惑和忧思 .....      | (31)  |
| 1.4 新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取向 .....     | (41)  |
| 1.5 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化寻绎 .....      | (52)  |
| 1.6 沈从文:精神家园的失落与重建 .....   | (60)  |
| 1.7 乡土:永恒的诱惑 .....         | (73)  |
| [本章附录]精神疲惫·文化阵痛和文学进路 ..... | (88)  |
| 第二章 形式的重建 .....            | (96)  |
| 2.1 历史与现实组合的艺术形态 .....     | (97)  |
| 2.2 “价值生活”:广阔的小说艺术世界 ..... | (106) |
| 2.3 多元的艺术探索 .....          | (117) |
| 2.4 未来中国乡土小说走向臆测 .....     | (127) |
| [本章附录]现代化:一个战略性的口号 .....   | (137) |
| 第三章 价值的探寻 .....            | (143) |

|                              |       |
|------------------------------|-------|
| 3.1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精神 .....         | (144) |
| 3.2 现实主义:艰苦的求索 .....         | (158) |
| 3.3 寻找与超越 .....              | (170) |
| 3.4 情暖人心:巴金艺术个性一解 .....      | (179) |
| 3.5 创作心境与艺术选择 .....          | (187) |
| 3.6 善与恶的悖论:《李氏家族》的历史哲学 ..... | (192) |
| 第四章 鲁迅的文学—文化实践 .....         | (201) |
| 4.1 辉煌的起点 .....              | (202) |
| 4.2 “看客”:鲁迅独特的形象创造 .....     | (214) |
| 4.3 《阿Q正传》的根本精神 .....        | (227) |
| 4.4 鲁迅小说民族风格论札 .....         | (238) |
| 4.5 论易卜生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 .....  | (250) |
| 第五章 东方的文学智慧与西方的艺术精神 .....    | (266) |
| 5.1 “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 .....       | (267) |
| 5.2 东西方戏剧的融汇 .....           | (277) |
| 5.3 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与超越 .....        | (293) |
| [本章附录]整合:戏剧走出危机的进路 .....     | (306) |
| 后记 .....                     | (310) |

## 导语：文学—文化批评的尝试

当雪莱宣称“诗人是世界的未经正式承认的立法者”<sup>①</sup>时，那种睥睨一切的自信，同卡莱尔说着诗人就是英雄<sup>②</sup>时的那种超拔一切的优越感，对于批评家来说，不啻是一种挑战和嘲弄。他们不免使批评家自惭形秽，退避三舍。在以创作为中心的19世纪，作家、诗人就是上帝，而批评家则变成了附庸风雅的“食客”。说来也颇可悲，这局面多半由批评家自己弄成。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使得那时的批评家们把自己变成创作的附庸。社会背景的考察，生平传记的研究，历史事实的比附，个人印象或直觉的描述……这些本来具有一定生命力和价值功能的批评方法，由于它的“成熟”（变得衰疲）和走向模式（被定于一尊），到头来，反倒限制了批评者，制约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20世纪，随着整个西方人文背景的转换，从对19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逐步扬弃始，文气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批评为中心，开始了文学“批评的时代”。因此，有的研究者评说：“20世纪可以说是批评的时代”。<sup>③</sup>文学批评不再是创作的

---

① 雪莱：《诗辩》，见琼斯编《19世纪英国批评文集》第163页。

② 卡莱尔：《作为诗人的英雄》，同上书第254—299页。

③ 张隆溪：《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陪娘”。它以敢于“拿来”的精神，从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吸取观念和方法，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都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界和方法，批评显出了它本来就应具有的独立自足性。也因此，文学更为丰富的内蕴和多重价值才得以被发现和承认。

西方文论由 19 世纪向 20 世纪的运演和转化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上述扫描自然是极其简化的。即使仅仅重温这一被简化了的运演和转化的历史，我们也仍然感慨良多。我们既惊异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文学传统之间差异的巨大；也惊异于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迟暮与守常。虽然，20 世纪的西方文论已开始了一个“批评的时代”，而且西方文学批评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也确实远在世纪之初及其后，即已传入和影响于中国文坛，但认真说来，除开新时期的批评实践，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事实上并无太大的变化。它们差不多仍旧停留在或沿袭着 19 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由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与方法所形成的传统，仍左右着中国的批评实践。其突出的表现形态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被定于一尊的“社会政治学批评”，亦即后来被人诟议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批评实践。在这种批评视界里，文学成了社会生活最简单的“反映物”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并最终导致了从小说中寻找“反党”材料的文学批评的闹剧和悲剧。文学创作并没有因为批评的理性之光的照射而辉煌闪耀，反倒被“批评”玷污了。这是文学的劫难，这是批评的悲哀！

也许是过去一段时间批评的这种“异化”，才有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一次全面的反拨与重建。一方面是 20 世纪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的介绍与实践；同时，我们也饶有兴味地注意到，从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传统的“社会学”的批评经过

改造、转化、丰富、整合,正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或社会——历史,或政治——文化,或社会——文化,或文化——历史,视角多维,视野开阔,正日益显示着它的生命力。其中“文化”的批评视野成为诸多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批评方向。人们力图从文化与文学的深层的密切关联中,在更为广阔的理论与文化背景下,寻绎并阐释文学的基本精神与丰厚意蕴,以求建构文学批评的新范式。

我把这种批评范式称之为“文学—文化批评”。从较为切近的学术背景去看,这种批评方法的出现,其原动力并不在于文学自身,而是80年代形成高潮的“文化热”的影响所致。80年代的“文化热”在经历了不可避免的喧哗与骚动并逐渐趋向平静之后,它仍然以其理论积累和理性积淀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大的方面继续着它的影响。因此,文化研究的深入,并导致文学批评的发展,实在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从文学与文化的一般联系去考察,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不是一个民族文化沃土上的产物。它的产生(构思、创作)与发展(接受、传播),无论如何脱离不开一定民族的文化背景,并最终反转过来,汇入民族文化的巨川,去冲积新的平原,去浇灌新的良田,去孕育新的生命”。如若从文化的本质与文学的特性去考察,文学—文化批评方法的出现也属必然。因为,“所谓‘文化’的实质(或曰价值所在),正在于它是关于‘人’的学问。任何关于文化的研究和讨论,最终都将落实到‘人’的建设这一根本点上。文学是更为直接、具体、敏感的‘人’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文化批评方法的运用与发展也是逻辑和情理之中的事情”。<sup>①</sup>

---

① 拙著《拯救与重建——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文学—文化批评方法的繁盛,从较远的背景去考察,它主要还源于中国作家及其创作实践的独特性。五四之后,情钟民族命运,魂系民瘼国是,深受以“入世”为显要特征的儒家文化影响的现代中国知识者们,他们始终如鲁迅先生所倡导、遵奉的那样,把文学视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重建民族精神的“利器”。他们倾其全力,去关注世情,去“干预灵魂”。20世纪中国作家文体意识自觉的两个时期——“五四”与新时期,虽然有不少作家在自觉从事各种各样的“形式”实验,但在整个文学创作的格局中,鲜明地把“如何写”放在首位,专心从事于“形式”实验的作家恐怕仍是少数而且实绩有限;大多数作家则是最先关注着“写什么”。他们总是从“人”的建设,从文化、历史、心理……的意义去观察,去思考,去创作。这类作家人数众多,成就斐然。无视这一创作现实,是批评的失误。但困难在于,一方面,传统的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显然无法正确阐释这种内蕴丰厚的创作实践;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的“社会政治学批评”方法的“矫枉过正”,新时期一度兴起的“纯艺术批评”,又无力承担上述任务。<sup>①</sup>文学—文化批评方法的出现及其实践,刚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文学—文化批评实现了两种超越。一方面,它是对传统的社会政治学批评方法的超越。这一方法不再将文学视同社会生活简单的“反映物”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将文学纳入整个文化大系统中。文学意义的寻找并不只见其政治社会学内容,而是从文学与文化大系统的关系和作用中去发现;另一方面,它是对作为传统的社会政治学批评方法“矫枉过正”的“纯艺术

---

<sup>①</sup> 这样谈论问题不在表明,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可以忽略对于文学创作的艺术批评;只在强调,仅仅运用“纯艺术批评”将很难全面阐释“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全部现实。

批评”方法的超越。文学—文化批评表现出了更为广阔的批评视野。它以更大的热情去关注“人”的存在和社会历史文化的进程。文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艺术的建构与人的建设,作家的艺术活动与时代的动荡迭变,都在这一批评方式中找到了联系点和研究的突破口。<sup>①</sup> 唯此,文学的全部意蕴(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美学的、心理的、语言的)才可能得到更充分的阐释。文学才不至于仅仅视为纯粹的个人活动而与文化演进和历史变革无缘。才有可能更鲜活具体地揭示文学的时代风貌、历史特征、文化内蕴。我乐观地相信,文学—文化批评方法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将导致在更大程度上,广泛地发掘与实现文学的价值和功能。

批评是一项需要才气、学识而且相当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理论上的认同并不等于批评实践的成功。一切都刚刚开始。作为一种批评尝试,我们寄希望于文学—文化批评的未来和发展。愿文学—文化批评的实践,带给我们以新的批评视界和新的批评景观。

---

<sup>①</sup> 参见凯声:《现代中国小说的文化寻绎与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 第一章 文学：文化·历史·生命

视界的变化，常常会使我们从批评对象身上发现许多过去不曾观照到的东西，因此而带给我们以新的批评景观。当年，鲁迅先生准备著写的中国文学史，曾把六朝文学这一章拟为“酒、药、女、佛”，把唐代文学这一章拟为“廊庙与山林”。藉此，我们得以窥见到先生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中国文学史的著写虽然最终并未成行，但我们却从先生那篇才情横溢、恣肆汪洋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具体地领略了先生那阔大的批评视界。演讲中，他不仅谈到黄巾、董卓大乱，党锢纠纷，曹操亲政，而且还饶有趣味地说到文人的“服药”、“饮酒”、敷粉巧饰、痴情任性……。魏晋时代文学的“自觉”特征、浪漫风貌、历史内蕴，被神采毕现地和盘托出。鲁迅先生从“文化”视角考察文学历史的批评实践，给我们以深深的启悟。

在这种被拓宽的批评视界里，文学自然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狭隘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的“副产品”，它不应再硬性地被定为这二者直接的、简单的“反映物”。它是包括上述两个方面因素在内的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一种“文化”的视角去审视，我们发现，始终服膺于“人”的建设这一宏伟构想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近一个世纪来的政治动荡，历史风云，它同时还向

我们展现了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文化潮动中,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尴尬的存在状态及其艰难的新生——封建伦理纲常的崩决与新的道德观念的确立;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化与富于现代意义的价值取向的择定;思维方式的变异,行为模式的重建,国民性格的再造;以及民族灵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冲突的生命欢笑与悲歌……文学,向我们铺开了一个文化——历史——生命的丰富博大的艺术世界。

## 1.1 文化视角中的五四乡土小说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现代转化的历史碑铭上,“五四”被深深地镌刻着。象一个常被讲述但又永远让人感到新鲜的故事,“五四”成为一个永远的话题。诞生于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五四”乡土小说,它在东西方文化冲突撞击中的勃兴,它所表现的理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选择的态度,以及现代知识者在这种批判选择中“两难”的文化心境……在向我们昭示着富于当代意义的文化精神。

### 缘起:两种文化的冲突与撞击

认真说来,“乡土文学”的大量涌现、勃兴,是 20 年代中期的事。寓居北京、上海等现代都会的知识青年,在开放的异地,写着遥远但却熟悉的故乡,抒发着他们爱与恨相胶结的情愫。但现代“乡土文学”的诞生其渊源却要早于此,其最初的源头无疑应当追溯到“五四”前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的现代转化运动。它给沉闷闭锁的华夏古国吹进了缕缕新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近、现代进步的思想文化财富,作为一种异质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最先在中国发达的现代都市传播。而远离现代文明的闭塞的乡村,却继续保持着小农宗法的封建文化。这样,城市文化因较多地汲取异质文化的进步营养,便以其现代品格,作为古老乡村文化的对立物而存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发下,一批祖居偏远乡村的知识青年从闭塞的乡村走入都市。在这种新的文化环境中,他们汲取着城市文化的营养,反顾着、批判着传统的、落后的乡村文化,同时也表现着此间自我心理上诸多的冲突、焦灼、痛苦及调适。于是,一种奇异而又正常的文学现象出现了,以描写乡土生活,审视乡村文化为内容的“乡土文学”,却因了城市文化的催发而破土抽芽,茁壮成长。

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其本质上是一次“人”的自觉,“人性的解放”的文化运动。这一带有鲜明“现代”胎记的文化思潮,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政治思想界“劳工神圣”的思想的传播,与文学领域里“为人生”启蒙的文学思潮的高涨,无不导源于“人性的解放”的文化思潮。它们又都给“乡土文学”作家以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天安门前的集会演讲中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不啻是一种昭告。它表达了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思潮的濡染下,对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劳动者的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思潮下,农民问题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3号开始在《社会调查》栏内刊载关于农民问题的情况介绍。同期的《震泽之民》(张祖荫)一文,正是一篇乡村生态的报告。1920年创刊的《醒农》,创办者把“促农民之觉

悟”，“谋农业之改进”<sup>①</sup>定为刊物的宗旨。《钱江评论》也强调提倡新思潮的人决不可忘了农民<sup>②</sup>。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对于中国农村的黑暗状况，以及青年应取的态度都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他号召青年关心农民疾苦，帮助他们“脱去黑暗”。这种尊重劳工、关心农民的文化思潮，给当时包括“乡土文学”作家在内的广大新文学者以巨大的刺激与启悟，它影响并开阔了作家们的视野。

统一于“人性的解放”这一文化思潮下的“人的文学”、“为人生”启蒙主义的文学思潮，作为城市文化的又一方面，也给“乡土文学”作家以影响。创造社一任主观情感渲泄的浪漫的、抒情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并实践的“为人生”的“血和泪的文学”，特别是新文学伟大旗手鲁迅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撕破一切“瞒”和“骗”的假象，深入地大胆地写出广大乡村落后闭塞，广大农民苦难愚昧的艺术实践，给了“乡土文学”作家以深深的启迪感召。他们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在“为人生”的总目标下，展示了一幅幅独异的乡村生活画卷。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乡土文学”作家们对于城市文化并非完全认同、适应。这种不适应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现代中国都市不仅深藏着数千年的封建古道（尤其如北京这样的老城），而且从一开始它们就受到西方商业文化的冲击，畸形地发展着。作为半殖民地的城市文化是部分地被腐化了。它本身也并非一种健全的文化；其二，“人情同于怀土”。这是人类的普遍情感，而中国现代作

---

① 《发行〈醒农〉的用意》，《醒农》第1期，1920年5月。

② 《代农民呼吁》，《钱江评论》1920年4月。

家在这一方面表现又尤为强烈。他们的乡土根性极强。他们的童年、少年时代大抵在故乡村、镇渡过，后来漂泊到北京、上海等都市念书、谋生。这里虽有乡村所没有的红灯绿酒，夜半歌声，但都市的浮嚣、繁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欢快。萦怀故园不堪思，依依乡情理还乱。乡下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趣味……一时还难以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或有意保持着不合作态度。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有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了灰色罢”<sup>①</sup>。这感慨，这失望，是他们心灵的回声。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固守“乡下人”精神家园的努力，这种复杂的、矛盾的、微妙的心境，许多时候使他们反倒与身边的现实都市生活过远，而与过往的故乡生活更近，于是他们便时时回顾和眷恋着故乡。“乡土文学”中因此而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对浓烈的乡愁乡情的抒写，对朴质、静谧的乡村生活（浑然的自然景观，醇厚的人伦风情）的礼赞。“乡土文学”作家这种矛盾的创作心境，与错综的审美选择，自然仍是导源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与撞击。也许，正是这种冲突与撞击，“五四”乡土小说才这般纷繁多姿，它才留给今人如此丰富的文化富藏。

### 批判：理性的选择

在“五四”乡土小说多元的价值中，最能引动我们注意的自然首先是它表现出的文化批判的精神，以及蕴含于这“批判”过程的理性的文化选择意识。

当“乡土文学”作家们以一个都会文化的负载者——觉醒的现代知识者的眼光去冷静地审视他们曾经生活其中的乡村文化时，

---

<sup>①</sup> 黎锦明：《烈火》集再版自序。

种种落后、封闭、沉闷、愚昧的景象首先进入他们的视界。这种因神圣忧思而带来的焦灼、激愤，表现为一种峻急的、强烈的文化批判。这种批判是对乡村农民群体生存方式——他们的生态与心态的一种整体剖析。

“愚昧的山谷里，生活着一群幸福的人们。”一位诗人用这样的诗句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文化环境同人的自觉以及社会进步诸问题间关系的看法。是的，当人类对自己所处文化环境的认识还处于一种非自觉的、混沌模糊的状态，当他们还在自己所创造而又异于自我的文化环境的盲目推动下无意识地前进的时候，这时的人类还是蒙昧的未开化的。“五四”乡土小说以大量的篇什，向我们展示了诸如“水葬”“冥婚”、村仇械斗、“典妻”“偷汉”、鬼节超渡……一类乡土风俗，在理性的批判中，突出表现了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民落后愚昧的生存方式。蹇先艾的《水葬》向我们展现了古远的贵州乡间习俗的原始冷酷。虽然已是民国时代，但这里仍沿袭着古老的把人推下水去活活淹死的“水葬”。产生并保持这习俗的是“古已有之”的“文明”——“文明的桐村向来就没有什么村长……等名目，犯罪用不着裁夺，私下都可以处置”。唯其“古已有之”，它才陶冶出了一批适应这文化环境的人。桐村人对于“水葬”不仅表示出一种文化认同，而且还为这精神盛举而兴奋。他们“都为着热闹而来”。被水葬的骆毛也如阿Q般无师自通地喊出了“再过几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的告别演说。作者把批判锋芒明白地指向了“桐村文明”。千百年来停滞的小农生活方式陶冶了这原始而又野蛮的乡俗，并最终成为桐村人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

许杰的《惨雾》所描绘的文化景象更为野蛮惨烈。玉湖、环溪两村为一沙渚，展开血淋淋的世族械斗。在这些农民身上表现出如此严重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作风。械斗的双方所为只是“希

求有最好的上风的名誉”——那毫无价值的、老中国儿女们所注重的“面子”。更为可悲的是，这乡俗作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反过来又强烈地影响着乡村的生存方式，制约着农民人格、心理的健全发展。械斗的双方都把这最野蛮的行径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听到锣声，人们“如同着了魔一般”，一个个表现出病态的亢奋。马克思在批判封建宗法社会时曾说过：“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sup>①</sup>。封闭的乡村文化最终导致了农民作为“人”的生命的退化，导致了文化的“返祖”。

现代人文地理学有一句名言：“文化产生于自然景观”。落后愚昧的文化心理，总是在文化隔离的条件下形成的。几乎可以作为中国“国粹”的封建迷信心理在中国乡村尤为炽盛，正缘于此。“宿命难逃”、“鬼魂脱生”这类被文化人类学家称之为“原逻辑的”思维方式仍弥漫在广大乡村。部分乡土小说表现了乡民们这种蒙昧的文化心理。王鲁彦《菊英的出嫁》描写了由上述心理造出的东方农村奇观。人死而为鬼也照样生长，和活人一样有婚嫁的要求，于是死去十年、正满十八岁的女儿，母亲为其择定一个鬼婿，选好良辰吉日，隆重地举行婚配。而且，每一个参加者都是那样真诚！这文化景观令人惊叹，也令人颤栗！透过乡民这“集体心象”，我们看到封建锁下中国文化的落后、原始。穿透蒙盖着这场“白日梦”的重重帷帐，我们不难发现，为鬼排解寂寞，实则是现世活着的人寂寞的一种渲泄。

彭家煌的《活鬼》显示着宗法农村的另一种丑风恶俗。富户某

---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为求得家中人丁兴旺，便放纵自己女人、寡媳去“偷汉”，因效果不佳又将刚及十三、四岁的孙儿娶一大龄女人，于是演出孙媳房中经常闹鬼的悲喜剧。许多乡土小说也都反复写到南部中国的“典妻”之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连阿Q都知晓的人伦大道。言为“人伦”其实并不讲“人”。正是这种封建伦理把人尤其是女人异化为非人，成为男性传种接代、宣淫泄欲的“工具”。这异化在闭塞的乡村看来，实乃司空见惯、天经地义的事情。世代相传的停滞的生活方式，压抑了人性的自然生长，导致了“兽性”的滋生膨胀。“乡土文学”在对这些道德沦丧行为的描写中，喊出了对于以男性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诅咒。

“五四”乡土小说并不满足于只是把自己文化审视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对乡村文化一般性的批判上，他们试图在形象的思考中，挖掘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寻找它最致命的病灶。王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小说所写确乎一个“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一个在城里读书8年的大学生子平归家探亲，因为不合乡村古老的规范而终于被活活致死。林家塘人以传统的乡村文化规范去衡量子平，于是从另一文化环境中来的青年从说话声调，走路姿势，衣服款式，帽子戴法，甚至进食的“吃相”，都因不合古老的乡俗而成为越轨之举，一一遭到非议。同子平合影的十几位女同学全部被说成他的“相好的女人”并最终传为子平有十几个老婆。子平最后糊糊涂涂地以“共产党”的罪名被他叔父告发，在全村人通力协助下官兵抓捕了子平并拷打致死。透过子平的悲剧，我们看到了乡村文化那种凝固、保守的“东方不动性”的品格；看到了杀死子平的这种文化模式的可怕的结构一功能。

林家塘人的反映是自然的。封闭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们保守、狭隘的文化心理。他们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守护着自己那古